



垦荒者之读工作方法

陆达

通俗讀物出版社

县委書記談工作方法

陸　　達

通俗讀物出版社

从 1957 年冬天以来，我們山西省解于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在全民族整风高潮的基础上，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这一高潮来势凶猛，势如破竹，显示了农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运动的发展不仅推进了农业生产自身的飞跃，而且大大促进了工业的飞跃发展，促进了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高潮，也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形势的发展是这样的有利，人民群众以自己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奇迹，回击着“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讓他們秋后算账吧，账总是要算的。大跃进形势的发展，再一次証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英明正确，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綫的领导方法的胜利。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的运动中陶冶着我們每一个同志，丰富着我們的知識和經驗。”現在

运动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为着使我們的领导不至于落后于群众而能够站在群众前面，~~把运动推向前进，有必要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精神，以党的群众路綫的历史經驗，来检查总结和改进我們的领导方法，进一步适应农业大跃进新形势的需要。

带头实干，商量办事

在乘风破浪势如破竹的社会主义建設运动中，党的群众路綫有了新的发展，許多同志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群众路綫是法宝”，并且正确地运用了党的这个法宝，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誠摯的拥护和衷心的爱戴。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有力的促进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設的全面大跃进。

是亲手劳动，迁事和群众商量，調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呢？还是简单粗暴强迫群众办事呢？在这个問題上，本县西张耿乡星火三社副主任上官登福同志前后有过两种不同的尝试。1956年他担任王馬村支部書記兼大队长时，作风生硬、办事主观。那年搞水利，他心想在峨嵋岭上打井，把四周围旱地都变成水地，可是他不和群

众商量，不看当地条件，老农上官海寬和上官玉德曾劝他說：“高岭打井深的沒有王法”“高岭地底都是沙子，万万打不成”，他不听，硬組織了六十三人，打了六天六夜，刚一見水，井就塌陷了。还有一次他到二队检查工作，看到二十多个妇女在地头休息，不問青紅皂白便大嚷起来：“你們是鋤地，是歇着？不願干回去！”結果当天下午这二十多个妇女都沒有上地。群众听说登福来了都躲着走，不敢見他面。由于他的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以致形成工作推推动动，不推不动。1957年春天他到县里参加整党會議，大队长一走，社員松了一口气，正正六天沒干活，整党會議結束后，他順便先讓大車把行李捎了回来，村里人一見登福的行李回来了，便都慌了，赶快套車送粪。群众見他都怕三分，村里人給他起了个外号叫“銷金鍋”（意思是硬得很），“活象閻逢春（蒲剧名演員）出鬼門道，吹鬍子瞪眼睛”。

“事物总是走向他自己的反面”。經過多次的嘗試，到1956年下半年，他开始感到自己孤立了，“滿腔热情想把工作搞好，却把工作搞坏了！”1957年春天他到县里参加整党會議，心想，“什么关都好过，就是这一关不好过”。情况还

好，终于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他觉悟了，决心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回村以后当众检讨，表示决心改正，可是群众不大相信，这怎么办呢？“不管怎样，非拿实际行动给大家看不行。”这年春天，大社布置开展积肥运动，他便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出主意找肥源，社员们主张把村西池塘的残土污泥挖出来，再利用池塘沤粪，办法挺好，他接受了这条意见，亲自和社员一起积肥，一次积了四千三百多车，超过原定任务的23%，得到了大社的表扬。第一炮打响了，再来第二炮。他又亲自带动群众送粪，六十多个人担的担，抬的抬，不到半个月，把4643车粪都送到地里。这年搞水利，他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不再主观了，和群众共同勘察研究，看谁的法式对，就按谁的主张办，结果打一眼成一眼，打了七眼井就基本上实现了全村水利化。由于他的作风转变，启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又抓住了水、肥两个增产的根本措施，因此获得了丰收。棉花平均亩产204斤，超过1956年亩产160斤的30%，得到大社超产奖励金，并连得三次红旗。群众把他评为劳动模范，有的社员说：“咱村丰收，主要是党支部领导的好”“登福是急中有智，粗中有细”1958年他两次到临汾、河南

參觀，人在外，心在家，生怕工作搞不好，可是他回來一看，麥子收好了，棉花長得齊齊正正。你看一前一後，兩種方法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他自身設置的對立面，是一個多么顯明的對照，使他親身體會到黨的群眾路線是法寶。

象上官登福這樣的人，在全縣不是個別的，為了徹底轉變幹部作風，1958年年初我們在一千七百人的幹部大會上，介紹和推薦了上官登福同志轉變作風的經驗，這對於許多同志的思想作風的轉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對幹部作風的轉變，有兩首民歌是一個很好的寫照，在幹部沒有參加勞動之前群眾說：“六分干（指社員），七分看（指隊幹部），掙大分人不出汗（指社幹部）”。“騎洋車，留分頭，嘴插紙煙蹴地頭。”可是幹部作風轉變之後呢？社員們說：“幹部帶了頭，群眾加了油，上下一股勁，豐產不發愁！”

一位紅旗大學教授的成長

事情同樣出在西張耿鄉。這個鄉的星火一社一位技術股長名叫王運升，提起這個人，解放前只是一個普通的搬運工人，解放後當了村上

的生产委員，对农事一窍不通，但是他有一条坚定的信念：“听党和政府的話，相信科学技术，刻苦鑽研，亲手試驗”。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变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紅色专家。1952年他开始搞棉花治虫和試种碧玉麦，由于沒有經驗，不懂技术，滿脑子希望落了一場空，有人嘲笑他，故意为难他：“你說，我家驃子怎么不下駒子啊？”失敗和嘲笑是坏事，也是好事。他不但沒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苦学苦鑽苦練的决心。白天生产，晚上讀書，有时通宵不眠，苦讀苦鑽。

1953年这个村子办初級社时，他担任技术股長，夏季推行棉苗根外噴磷，有些农民笑話他：“庄稼叶子和鼻子一样，是管出气的，还能讓鼻子吃飯？”“往叶子上施肥真是听也沒有听过”。群众不相信根外噴磷的好处，他就先来个小田試驗，上午噴了磷，当天下午叶子就由黃轉青，結果怎样呢？凡是噴磷的一株棉花平均有23个花蕾，一百个棉桃可称一斤棉花（斯字棉），一亩地收了五百九十四斤籽棉，可是大田沒有噴磷的一株棉花只結了18个桃，115个桃才秤一斤棉，一亩只收了三百斤。事实胜于雄辯，人們信服了，到了第二年，全社都推行了根外噴

磷。这村一队队长王随乙是他的对立面，运升提出什么，他反对什么。1955年推行頂凌耙地保墒，王随乙不同意还諷刺說：“王运升本事大，沒有頂凌也要耙，任你本事比天大，要不下雨也沒法”。結果一队推迟了半月才耙地，适逢春旱，可是試驗田和大田中推行了頂凌耙地的棉苗兒出的都齐全，只有一队缺苗40%。1954年推行棉花密植时，运升先在小田試驗，每亩留苗4千株，王随乙老汉一見就叫：“你疯了，留那么多株，怎么結桃”。可是收下来，还是运升的多。由于运升的試驗田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措施，因此連年丰产。几年来經過对比較量，事實証明王运升贏了，那些保守派們輸了，王随乙这才心服口服地說：“社里棉田增产，幸亏有这么个技术員！”从这以后遇到什么事都先問問运升，就连他家里猪娃子有病也要請运升去治疗。

运升把他的試驗田同社里的技术夜校紧密地結合起来。試驗田是教材，田間是課堂，用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通过試驗田培养技术骨干，使科学技术在农业社扎了根。五年来他培养了一千二百名徒弟，他的二十一名“大弟子”都是农业社的技术骨干。1958年6月15日西张耿紅旗大学正式成立了，大学聘請了王

运升同志担任了粮棉栽培系园艺系的教授，同样的他把試驗田同講授紧密地連結起来，有声有色地講解作物栽培的理論和实践。“树立起旗帜来，社会主义就快了”，你看他培植了試驗田，通过試驗田又提高了他的栽培技术和科学知識，就这样，这位土生土长的紅色专家，这位紅旗大学的教授成长起来了。

雨后花朵遍地开

解剖了两个麻雀，找出了一条規律：亲手种起試驗田，事事都走群众路線。这是又紅又专的道路，也是小田試驗大田推广的方向。

1957 年开始推广这个經驗，可是人們半信半疑。那时全县 41 个农业社，有 21 个社，五十四个干部种起了試驗田 278 亩，还带动了有三百七十九个干部，七千八百五十五个社員参加的三万七千六百二十四亩大面积丰产示范区，結果都丰产了，棉花都在百斤以上皮棉，最高額达到 929 斤（籽棉），可是那些不种試驗田的人呢，除了教訓以外，一无所得。

1958 年初在全民整风高潮的基础上，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声浪中，特別是从湖北省參觀

归来和在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干部搞試驗田的通知之后，情况起了質的变化，試驗田象雨后春笋般的到处丛生。种試驗田成了一种新的风气，許多干部都具有了种試驗田的責任感，一天离开試驗田就觉得心里不安，好象短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在田如在家，关心小田也正是为着关心大田。

这里的試驗田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額丰产試驗田，全县有 3463 个干部（約占干部总数的 80%）种起 12571 亩試驗田，另一种是大面积丰产示范区，全县 71 个农业社小麦丰产示范区 20 万亩，占到总麦田的 64.5%，棉田丰产示范区 20 万亩，占总棉田 83.3%，此外，社社都有自己的米丘林式多种試驗小农場。这三种形式是紧密地联結在一起的，同时它們又互相爭艳，干部的高額丰产試驗田都是設在大面积丰产示范区之内，直接起着小田試驗大田推广，点面結合的作用。米丘林式的小农場是別具风格，有計劃的設置了多种試驗的对立面，如优种与劣种，密植与稀植，深耕与浅犁，旱地与水田，白地与多肥等等，大胆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的新創造，这种比法是一个显明的对照，最容易使人分別优劣心悅口服，讓那些保守派們在多种对比試驗

面前，哑口无言，甘拜下风。比如王村乡燎原社的小农場是在技术股长閻清秀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一块六十亩大的多年內涝的草原地上进行小型多样的对比試驗，他們試种了十四种小麦品种，并且进行了行距、浇水、施肥等多种对比試驗，开始有些人沒有信心，認為“湿踩乾揭不长一些”，可是經過采用“翻起生土，晒成阳土，耙成細土，多上肥土，种在湿土”的五大改革措施，經過精細加工，他們的小农場丰收了，获得了許多丰富的科学經驗，其中四寸密植的碧碼四号高額产量 1730 斤，就是这样由落后田变成了先进田。而那些行距寬、不施肥的对比試驗呢，只是 1 百多斤。起初有人諷刺閻清秀說：“看他領着一个老头三个毛猴，能搞出个啥名堂”“憑你講技术，也不能在这块地上，长出好庄稼来”。可是小农場丰收了以后輿論变了，“只有懶人，沒有懶地”“庄稼在人做，只要下本就能增产”，小农場实际变成了技术学校，大田生产队常来看小农場的庄稼长的怎样，又采用了什么新技术，現在在全社范围内出現了学先进講究技术的新气象。

种試驗田的成員大都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員和农民三种力量相結合。通过这种形式貫彻

領導与群众相結合，政治与技术統一、科学試驗与培植技术人才相結合，就此使小田試驗起到大田推广的作用，达到又紅又专的目的。

我們县委工作組在五一社种的試驗田，党政干部，技术人員同农民一起劳动，边操作，边研究，边漫談，談农事也談国事，談生产也談心思。棉花整枝时，发现試驗田里还有三类苗，順便就和大家研究“試驗田里发现了三类苗怎么办？”技术干部王英杰同志說：“赶快再上速效肥料，多中耕，明天就开始。”随后又問老农曲志寬：“大田里有沒有三类苗？”志寬說：“有，比試驗田还多。”那么怎么办呢？于是經過一翻研究當場确定一条措施，抓紧火侯突击三类苗，給三类苗吃偏飯，快馬加鞭赶上一类苗。就是这样从小田出发，变成了大田的統一行动。我們在試驗田还采取了地头促进会的形式當場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我們种的一亩玉谷，叫做深翻三尺，底肥六万斤，指标七万斤。苗兒出土了，馬上开了个現場促进会，就地研究革新措施：第一是密植，老农曲志寬說：“只要深耕，粪飽，浇水及时，就敢密。”經過一翻算、听、比，確定采取三株留苗法，留苗六千四百株，一株三穗，一穗一斤，一亩两万斤，这还不够七万呀？第

二是間作，間作什么呢？这就有了爭執，爭執的焦点在紅薯蘿蔔上，老农志寬主张間作胜利一百号紅薯，技术干部王英杰、馬維新主张間作蘿蔔，他們說“玉谷向上长，蘿蔔向下长，一亩蘿蔔五、六万斤不成問題”，各有道理，各执己見“好吧，来一个对立面，半亩紅薯半亩菜，秋后产量分高低”，思想統一了，干劲更大了。志寬說：“玉谷出的不甚至，我今晚泡种籽，明天早上咱担水补种”。

县委做了一条决定：“凡是县委和技术干部的試驗田，有責任帮助当地农业社培养一批技术員”。五一社組織了一支“盜宝队”，派了一批得力的青年社員和老农参加試驗田，他們一盜湖北孝感稻田技术員涂修华同志之宝，一年学会栽培稻田技术；二盜棉花技术干部王英杰同志之宝，一年学会棉花栽培技术。他們白天在試驗田里操作，晚上在紅旗中学学习，真是生龙活虎，頗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概。这是一种科学試驗与培养技术力量相結合的方式，使人人走向又紅又专的道路。

开展高产红旗竞赛

这是一种比先进、赶先进最得手的形式。县委書記王学厚同志在下张耿种了三亩小麦試驗田，計劃亩产粮食两千斤（小麦800斤秋粮200斤）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了推动大田，三月二十八就地召集全乡队长以上干部开現場會議，經過这次參觀，掀起了高产红旗竞赛，試驗田成了挑起高产红旗竞赛的旗手，也成了大家比賽的对手。星火二社二队的麦田原来只准备浇水两次，追肥一次，參觀以后，他們提出了“超过試驗田”的口号，一連突击了三次加肥加水。比中出英豪，1958年小麦大丰收出現了許多高額丰收的旗手，据不完全統計，1958年千斤以上的小麦高額丰产田 332.2亩中，就有干部試驗田 274.8亩，占到 83.6%。

在小麦大丰收的基础上，我們为貫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推进大跃进的新高潮，召开了千五百余人参加的三級干部扩大會議，这个會議經过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掀起了一个高产红旗竞赛的新高潮。金井乡团支部書記平天才貼了一张大字报：

試驗田內插紅旗， 決心超過曲耀离。
技術措施作保証， 高產籽棉一萬一。
莫說今日說大話， 但願秋后見高低。
金榜題名登科舉， 北京去見毛主席。

這一下就轟動了全場，到处掀起了高產紅旗競賽，清华乡紅星社也貼了一張大字報：

指 標

坐衛星，駕火箭， 棉花亩產頂破天，
举起斧，劈開山， 抬起腳來踏破天，
蹬開地皮挖破山， 百層地下找寶源，
學先進，趕先進， 超過先進兩萬斤。

措 施

深耕達到五尺半， 底肥上到三十萬，
一亩留苗近一萬， 株高長到六尺半，
治蟲打切不停點， 中耕做到三十遍，
及時澆水整十次， 混肥再施一萬三，
每株留担六十三， 共產籽棉整三萬。

肥 料

奈酸噴磷不落鈴， 磷肥追飽鈴似燈，
棉田工作不謹慎， 頭上碰個大窟窿。

再看一个蘿葡王，五一社付主任曲連杰同志的創舉：

你高，我比你还高！

学习总路綫，思想万万翻，

一个蘿葡六亿三，脹破地球頂破天，全国人民吃一天。

这是总路綫的光芒，是共产主义的风格，是六亿人民的气魄。“一个蘿葡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这已成为推动全县高产紅旗竞赛的动力，到处开展着“六亿三”运动，人人都种高产試驗田，五一社九队妇女队长李秀清說：“宁讓自我牺牲，不讓指标落空，手提粪篋肩擗担，不分昼夜加油干，日当千年。秒当天，要和卫星比后先”。她提出一亩棉田要产一万八千斤籽棉，追施一百斤颗粒肥料，及时打切浇水，发现虫害一个鐘头就消灭完。全民性的高额丰产紅旗竞赛运动激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个个爭先鋒，人人当英雄成了风气。种菜老汉曲自达說：“看到大家的干劲，棉花粮食都大跃进了，我老汉坐也坐不住了，也要来个跃进，我保証4亩9分菜地，每亩收入600元”。在竞赛浪潮中，木业組保証在八月以前将过去稀植穀全部改制成4寸—1.2尺寬播幅小麦播种穀，并且創